

書評

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

林芳玫

書名：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

作者：張君玫

出版社：群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2

總頁數：347

ISBN：978-986-6525-52-0

售價：新臺幣 360 元



這是一本文字綿密的書，作者張君玫以翻譯理論討論中國與臺灣的後殖民情境，用縝密的文字將現代性的歷史大敘事所呈現的線性時間觀以及二元對立拆解鬆動。張君玫使用「分子」(molecular)為喻說，強調兩種語言在翻譯過程中，翻譯書寫對既定語言產生的微細變化、挪移語言本身原來的界線，創生出新的想像與可能性。本書序文作者之一丘延亮指出分子在生物學中做為意符 (signifier)，具有明確的指涉對象——某種可以實證辨認的東西，因此不適合用來喻說語言的切割、融合、重組、轉化、雜揉。筆者認為，分子生物學作為一門科學，無法發明一套自身的符號系統，而是高度仰賴日常生活的話語喻說，用來敘述研究對象與研究技術。在分子生物學中，基因需要表達 (expression)，表達的第一步是把 DNA 轉錄為 RNA(transcription)，第二步是把 RNA 翻譯成蛋白質 (translation)。

假如轉錄與翻譯的確有清楚的對應關係，那麼分子生物學教科書也就不必經常更換，科學家想要人工複製牛羊也不會如此困難。正因為分子生物學本身充滿不確定性，這個學科借用了「翻譯」這個概念，本書再將之挪用，我們對分子化翻譯此概念，也就充滿新的想像可能性。

本書共有五章，前三章可視為「分子化翻譯」的範疇，因此本文將先介紹前三章的論述，再進入後兩章的討論，並進一步分析其論述策略及可能形成的問題。第一章探討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對西方與世界的想像。文中指出以歐洲主體所倡議的世界主義，往往是強勢位置的慈善態度，至於非西方版本的世界主義，則充滿自我批判與自我提升的渴望，意欲「參與」強勢文化的改造意向。在中國現代的世界主義論述中，可以看到當時知識份子以線性的演化觀，希望落後的中國可以急起直追。當時主張全盤西化者與折衷者的論辯都集中於去脈絡化的、僵固的、整體性與同質性的西方想像，作者因而提出分子化翻譯的概念，介入數次西化論戰中的二元對立，強調「化成為西方」所牽涉到的分子微細流動，將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邊界挪移、穿越、轉化、創造。

第二章討論清末民初各種翻譯家的見解——意譯、直譯、硬譯、死譯，由此探討當時翻譯者對改造中文的想法。翻譯是創造與轉換過程，改變了既定文化的視界。當時翻譯者關心的是：翻譯成中文時，歐洲文字的語法是否保留其原貌（直譯、硬譯）？抑或是瞭解原意後以中文句法表達（意譯）？這些不同的看法牽涉到論者對中文的見解。魯迅等硬譯派認為中文本身造就了封閉落伍的思考方式，硬譯派讀起來不通順的句子，其實正是對中文句法的改造，可以經由這些怪異的句法達成認知轉型，最終可深層地改革中國文化。翻譯因而是整體中國現代性計畫的關鍵策略，經由引入歐式語法，讓中國快速進入進步的歐洲文化思維。此章開始介紹並批判黑格爾的語音中心主義，與第三章有所重疊。

第三章討論民國以來拼音運動提倡者對漢字的見解，這些人認為象形字落後封閉，停滯不前，必須廢棄漢文，採用拼音，改良中文文法，

如此方能將中國帶入進步的現代性。拼音優越論與黑格爾的語音中心主義不謀而合，張君玫在此詳細討論並批判黑格爾的語音中心主義，同時企圖解構當時這些拼音提倡者所陷入之進步 / 落後、拼音 / 象形的二元對立。

第三章就論述順序而言，先整理民國以來的拼音運動及其反漢字立場，較後面才提出對黑格爾拼音中心主義的後殖民批判，作者並未企圖將黑格爾與中國的拼音運動說成是前者影響後者的因果關係。然而，以黑格爾拼音中心主義為這些論爭設框 (framing)，未能從中國本身以及世界各國的拼音歷史切入，將有去歷史、去脈絡之虞。關於綿延超過一世紀之久的中文注音 / 拼音實踐及其複雜的歷史糾葛，作者僅以兩頁篇幅交代 (173,174 頁)，而後面對黑格爾拼音中心主義的介紹，則花了將近十五頁的篇幅 (184-199 頁)，不免顯得有些喧賓奪主。

讓我們重回社會語言學的歷史研究來看待拼音運動的多重脈絡。拼音的脈絡相當多元分歧，彼此有重疊之處——對發音的重視，但這未必是黑格爾語音中心主義。發音的政治與歷史脈絡可分為正音、注音、西方傳教士以羅馬字拼寫方言、以及中國人提倡以羅馬拼音取代漢字書寫。作者探討的是第四種，其他三種在本章並未提及。拼音的緣起之一主要是為了正音，為了語音的標準化，即使本來就是拼音文字，也需要正音。19 世紀以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各國急切地想要制訂標準語作為國族象徵以及提供國家政治施為的合法正當性。從口說語音到書寫的文法，都是國家意欲標準化與普及化的對象，此現象逸出黑格爾語音中心的思維。民初部分拼音提倡者主張廢除漢字，這些主張即使充斥著進步 / 落後之線性演化觀，看起來似乎符合黑格爾語音中心論，但事實上只是部分人士在文化場域的主張，最終並未取得優勢。

第三章的論述看似詳細，但真正講拼音運動的部分集中於 173-174 兩頁，在這兩頁中卻將「注音」運動與「拼音」運動混為一談。前者以注音字母 (後來改稱注音符號) 為輔助工具，目的在學習漢字；後者抨擊

漢字，意欲廢除漢字，二者差別不可謂不大。但本書在處理民國初期 30 年間的發展時，為了批判黑格爾語音中心的偏見，或有誇大廢漢字陣營聲勢之嫌，而對於官方所主導的注音符號著墨較少。

如今，注音或拼音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習慣的一部份，例如查字典以及電腦中文輸入；同時，作為改造漢字的現代性計畫，它仍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當下環境裡，持續帶動政治與政黨鬥爭、意識型態鬥爭、以及對本土 / 國族 / 國際優位意符的爭奪。在臺灣，相對於注音符號已經全面普及，漢字的拼音系統究竟要採用通用拼音或漢語拼音？這個問題一直是個高度敏感且懸而未決的政治議題，本章卻僅以簡短的一句話帶過（174 頁）。本章選擇不去面對當代發展，是否因為這些現象無法套入黑格爾語音中心主義？

第三章除了拼音 / 廢漢字的論述，也分析了當時論者對改革中文文法的意見。作者以馬建忠的《馬氏文通》為探討對象，長達五頁的討論（199-204 頁），馬建「忠」都寫成馬建「中」。或許，這並非單純的錯字，而是本書的文化癥狀：重視西方而忽視東方。本書標舉後殖民的旗幟企圖解構西方，結果反而暴露出對西方的戀慕以及對中國（與臺灣）的輕率。這本書的基質 (matrix) 是以各種西方理論交織成多層次、去中心的論述網絡，將黑格爾、德希達、史碧華克等人放置在網絡的節點 (nodal point)，而中國的經驗現象被拆散成片段，拼貼到不同節點之間的縫隙。前三章的中國，還能以片段方式倖存。到了第四章的女性主義，女人有如幽靈般若隱若現；而第五章重探臺灣後殖民論述，提出拉岡精神分析之空缺主體，臺灣則已被徹底地被抹消了。

第四章從地方與倫理的角度思考全球女性主義與在地女性主義二者間的角力拉扯，並探討此種二元對立消解與創生的可能性。作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地方的抗衡顯得更形重要，地方的研究取向也促使我們注意轉移中的女性主體位置及其發言倫理。「地方」並非固定不動、具有清楚疆界的地理空間，而是具有關係性與動態性的相遇的所在，乃

是社會關係網絡的過程。要探討地方的意義，必然涉及到社會行動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界線的實質活動。「地方」不必然是向內而排外的，也不必然是往前回溯的歷史性，而是可能向外連結開放或是往未來眺望。換言之，地方的意義是未決的，取決於地方行動者的空間性與時間性流動。

不同於第二、三章具體提出翻譯實踐以及中文的拼音與文法改革運動，第四章對中國婦運或是臺灣婦運並無任何介紹分析，恰恰好是本書呼籲要避免的「抽離時空」。倘若此章專注於西方理論的介紹闡述，讀者或許也就不必期望作者對中國婦運或臺灣婦運提出分析。然而頁 223 卻又以三行字匆匆提起：「以中國近代史的『女性』角色來說，或『婦運』的可能性而言，……，我們無法談論任何抽離時空的『婦運』。」

這一整章完全是當代各種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作者寧可引述土耳其學者以英文寫成的關於「面紗」的多重文化意義，也不願意援引中文學者的論著。從解放纏足到廢除養女買賣，中國或臺灣的婦運及其論述，難道無法與其西方或非西方的女性主義對話嗎？

作者重理論而輕實務，將不免陷入對部分西方學院派女性主義理論者的盲從，例如照單全收這些人對聯合國婦女政策的批評。史碧華克經常以簡短篇幅批判聯合國，不屑於提出更細膩的論證。作者除了附和史碧華克的立場，又於 228-229 頁引述塔露和妮蘭雅納 (Tharu and Niranjana) 於一篇 1994 年期刊文章中對聯合國的批判。依據筆者對聯合國相關研究論述的理解，聯合國於 1995 年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將焦點由「婦女」轉向「性別關係」，而聯合國會議是各個不同國家、區域、非政府組織多方角力的場域，並非只有一種聲音。若是考察專門以聯合國為研究對象的論著，或是曾實際參與聯合國婦女會議，就會瞭解此議題的複雜性。當女性主義成為建制化的學院論述而失去與婦運的互動時，關於「地方」與「倫理」的思辨將顯得更加反諷。

第五章〈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是全書最為混亂的一章。本章主旨為「重探臺灣十幾年前展露的後殖民論述場域……，並提出陰性情境的

看法以便……重新置入物質性的動態探討」。作者所說的後殖民論述場域，係指 1995-1996 年間《中外文學》期刊上關於臺灣主體性的探討。該次論戰有多位學者參與討論，而非僅有單一觀點。筆者同意序文作者之一孫中興的看法：「這種高來高去的外國理論論戰，充其量只是茶壺的風暴……，是外文系或中外文學幾位同仁的同室操戈而已」。根據筆者對該次論戰的觀察，該論戰始於臺大中文系陳昭瑛對臺灣本土論的質疑批評，而後臺灣文學研究者陳芳明為文反駁。雙陳其相反而對稱的立場，以及其針對臺灣文學史觀的不同看法，並未被接下來的論者深入探討。後來演變成臺大外文系廖朝陽與廖咸浩的雙廖論戰，即使同屬外文系——但並非臺大外文系教授——出身的邱貴芬試圖以後殖民觀點介入論戰，終究難以扭轉廖朝陽以紀傑克 (Zizek) 為基礎的精神分析論述。這場論戰事實上與後殖民論述關連不大，本章鎖定廖朝陽，是為了更加細緻地探討紀傑克以及拉岡 (Lacan) 精神分析，而論戰肇始者陳昭瑛的論述完全不被提及。本章以後殖民論述開始，而後進入精神分析的歧路難以重回一開始關注的焦點。中外文學這場所謂「後殖民論戰」可說是詞語誤用、名實不符。作者在十餘年後跟著陷入這場混戰，以後殖民之名而冗長地討論精神分析，又加上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是否反而離臺灣的後殖民狀態越來越遠？

佔第五章標題一半的「陰性情境」直到結論才出現整段的論述。作者以短短數頁篇幅探討陰性情境，而它不只是第五章章名的一半，更是本書書名。整本書前四章與陰性情境幾乎毫無關連，第五章以臺灣女性小說開場，提起邱貴芬的論述，然後再用列斐伏爾 (Lefebvre) 與紀傑克的說法質疑邱貴芬，接下來女性小說的討論很快地被拋到一旁，作者的慾望對象是通過廖朝陽而專注於紀傑克與拉岡，最後於結論時冒出陰性情境，未能呼應之前提過的臺灣女性小說，也未能呼應第四章〈女人的地方與倫理〉。由此看來，陰性並不同於女性，那麼陰性情境究竟為何？此外，前三章所闡釋的分子化翻譯，到了第四章與第五章也消失不見。

這本書前三章具有連貫性，而第四章與第五章又各自獨立。整本書其實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至第三章為分子化翻譯，第四章為女性主義與地方倫理，第五章企圖探討臺灣的後殖民論述事實上卻偏向精神分析。

本書的人名索引，更也顯現了無以名之的癥狀：西方女性以其名字而非姓氏筆畫順序排列。「伊希迦黑」(Irigaray, Luce)並未出現於「伊」，而是「露西」。蓋洛普(Jane Gallop, Jane)出現於「珍」，而大名鼎鼎的史碧華克無法在「史」部分找到，而是「蓋雅麗·史碧華克」(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是否所謂陰性處境，就是女人的姓氏與名字被翻譯以後所產生的錯置體？

我們果真進入後殖民情境嗎？此書的陰性情境，是否被黑格爾、德希達、拉岡等男性大師佔有了大多數文本空間後，僅存剩餘的幽冥/無名之所？這本書若定位在當代西方理論的介紹，那麼此書提供細膩的耙梳整理，可說是一本博雅的好書。然而作者企圖介入中國、臺灣、女性的處境，其介入方式是將其視為闡述西方理論的引子，以致於他們被提起以便被取消(foreclosure)，此書本身就是饒富意義的被西方學術殖民的「癥狀」。作者拒絕進入臺灣學術界的內部對話及其脈絡，選擇性的放大男性學者及其精神分析觀點，弱化女性學者的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觀點。這個現象很反諷地複製了本書所意欲批判的對象：強化內/外、世界/本地、理論/經驗的二元對立及其界線。外部/內部是相對位置，本書彷彿處於西方理論圈之內，而將臺灣置放於界定其邊界的外部；意欲解構西方，卻反而證成了對西方的渴望以及對臺灣的賤斥。這樣的結果，恐怕是讀者、作者所始料未及的。期待作者未來以更多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將臺灣多元分歧的歷史處境呈現在讀者面前。

